安妮·弗兰克及纳粹屠犹记忆之前景

阿尔文·H·罗森菲尔德 文　宋立宏、梁民政 译

现在距离纳粹占领欧洲，数百万犹太人死在隔都、集中营和死亡营中已有约 60 年了。由于幸存者的记录、目击者的陈述、学者潜心的著述以及诸如美国纳粹屠犹纪念博物馆这样的公共机构的巨大努力，今天我们才能详细了解这些遇害者，就像我们能了解那些迫害者一样。而且，尽管主要问题仍有待解答，我们的知识基础事实上已有很多。然而，将注意力从纳粹屠杀的经验证据转向对其解释时，情况变得颇为困难。历史记录不断得到补充，但其意义仍然难以捉摸。另外，向大众普及纳粹屠犹的文字和影像常常大有问题。为有助于澄清某些问题，学者们有必要在简单地积累暴行记录之外再做点什么；同时，学者们也得重视这样的问题：纳粹屠犹史如何传承和记忆，特别是如何让公众传承和记忆。

尤其与那些姓名与事迹广泛流传的遇害者相比，为什么一个名字和一个故事所具有的影响力是他人无法匹敌的？这个人即是安妮•弗兰克。数十年来，她被挑出来作为著名的纳粹屠犹遇害者——是此人而非所有其他人给犹太人在希特勒欧洲遭遇的大灾难赋予了自己的相貌和名字。

记住安妮．弗兰克

我们记住的安妮•弗兰克是谁？在纳粹毁灭的一百多万犹太儿童中，为什么她的出现会如此突出呢？我们记住的安妮•弗兰克是我们想要记住的那位安妮•弗兰克。这个答案听起来简单，然而历史记忆的形成和传播却是复杂的，一系列因素——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和宗教的因素——不同程度地塑造或消解我们从过去得到的东西。因此，不仅仅有必要理解什么要被记忆，而且有必要理解谁在记忆，又为了什么目的而记忆。

头脑中有了这种想法，就让我们来看看文化和意识形态是怎样产生某种影响，把安妮•弗兰克变为遇难的首要象征，并看看她的形象在当代政治中的某些利用和滥用。就这两个方面而言，在一个重要人物从其历史基础中分离出来、获得神话形象之后，澄清历史和记忆之间的鸿沟就变得重要起来。也许没什么能够阻止这种“去历史化”进程的发生，然其某些负面影响可能通过“重新历史化”的反作用而得以缓解。在纳粹罪犯名录中，除阿道夫•希特勒以外，再也找不到更显著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去历史化现象了。希特勒活着的时候就成功为自己塑造出神话身份，死后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作为恶势力的主要象征。在纳粹遇害者名录中，除安妮•弗兰克以外，我们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人能在过去 60 年里获得传奇色彩，成为一种象征——尽管这种象征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掩饰了其生平的真相而需要更正。

在 1947 年首次出版后，安妮•弗兰克的故事时就比任何其它二战时期的个人叙述传播得更广。它不可能是犹太少年在战争年代写的惟一一本日记，但它是其中最著名、最受珍视的。它被翻译成约 60 种文字，发行了 25,000,000 多册，在世界上拥有广大读者群。另外，安妮•弗兰克的形象通过各种大众媒体——舞台、银幕、电视、舞蹈、歌曲、歌剧、绘画、芭蕾、邮票、纪念币等等得到改造和传播。以至于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安妮•弗兰克差不多是 20 世纪最著名的儿童（她惟一可能的竞争者是秀兰•邓波尔[Shirley Temple]），她的故事无所不在，几乎司空见惯了。然而，为什么她能受到如此欢迎，为什么是安妮•弗兰克而不是其他人的形象能持久地赢得好感，这个问题还没有被完全弄清楚。

我们将前面的问题稍作改动就是：我们选择记住的安妮•弗兰克是谁？这个问题颇为关键，因为有众多的安妮•弗兰克可供选择。然而只有一种超越了他者之上：在一个残暴且最

终是致命的不幸世界中，此安妮•弗兰克成了积极的象征，代表着清纯和极度乐观。人们对安妮•弗兰克产生的这种感受，可以从她的日记中找到支持。但很难说这种形象涵盖了她的全部自我陈述，也很难说其日记的早期读者就一定设想了这种形象。

早期对安妮．弗兰克的理解

《密室》(*Het Achterhuis*)是在战后两年首次面世的。那时对纳粹占领荷兰的记忆仍会引发阵阵痛楚。许多人想逃避这段恐怖岁月，并且（据推测）一点也不希望看到这本书，因此可以理解，奥托•弗兰克有一阵子很难找到出版商。当一家叫“接触”的阿姆斯特丹小出版社最终出版此书时，读者一开始相对很少。有些荷兰读者不安地在安妮的故事中看到了自己在战时经历的物质匮乏，他们不想将这本书作为对苦难的战胜来庆贺。相反，用简•罗门（Jan Romein，一位荷兰历史学教授，他发表了此日记的第一篇重要的短评 ）的话说，有许多理由表明安妮•弗兰克的故事是悲观的，因为它描述了“真正骇人听闻的法西斯主义”，展现了“我们不敌人的兽性”[1]。

罗门将安妮的故事看成灰色的，他认为这本日记首先是作为历史文献而有价值，它揭示了纳粹灾难在政治维度上的重要真相；而其他读者更倾向于将该日记当成个人遗嘱。他们钦佩这孩子的诚实和勇气，欣赏她活跃的理解力和敏锐的精神，相信日记作者所表达的满怀希望的信息超越了她记下来的事件中的痛苦。

因此毫不奇怪，人们可以发现，此书从一开始就激起了不同反应，对它的理解也不相同。然而经过相对短的时间之后，解释范围变窄，而后向更固定、更程式化的方向发展。例如，众多美国评论家理想化了安妮•弗兰克的故事，倾向于将其解释成激励而不是哀伤。美国读者喜欢将该日记当作希望的遗嘱，正如一名评论家在评价此书时所说的：“救赎的闪光将会出现”[2]。另一位评论家坚信，无论安妮所处的环境多么困苦压抑，安妮的精神不会被“囚禁和挫败”[3]。连埃利诺•罗斯福这样的公众人物也断言这本日记“深刻突显了[人类]精神最耀眼的尊贵”[4]。

强调安妮日记振奋人心的方面而弱化它更为悲惨的方面，这种倾向在 1955 年的舞台剧《安妮•弗兰克日记》中达到顶峰。该剧由弗朗西丝 • 古德里奇和艾伯特•哈克特编剧。较之所有其它对这本日记的解读，安妮•弗兰克的形象经过古德里奇和哈克特的改编，显得更欢快活泼，终究是积极的。从根本上说，两位作者再创造出一个作为胜利者的安妮•弗兰克，赋予她不可抑制的希望和锲而不舍的乐观，最终可以让人感受不到任何残酷的结局。两位剧作家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在剧本末了让奥托•弗兰克说：“说任何人会在集中营里感到高兴似乎是奇怪的。但他们先把我们带到荷兰的集中营时，安妮在那里是愉快的。”

这种改编既令人难以置信又无聊，但它引起了共鸣。沃尔特•克尔（Walter Kerr）为《纽约先驱论坛报》写的剧评说：“安妮•弗兰克仿佛一只不能关在笼子里的小鸟，带着漫不经心的欢乐，她翱翔在本剧中心……安妮并非要去死；她要在生命中留下痕迹，而让死亡带走剩下的一切。”[5]《纽约邮报》的评论员赞同这种观点，写道：“剧本给安妮•弗兰克重新赋予了血肉——好似她从未死去。”[6] 离开剧院的观众当然知道安妮死了，但会感到她从未被击败。

简言之，出现在这个剧本中的安妮——以及后来于 1959 年出现在乔治 • 史蒂芬斯电影

---

[1] 简•罗门（Jan Romein）的论文在 *A Tribute to Anne Frank* 中得到了重印。此书由 Anna G. Steenmeiju 编辑（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 Company, 1971），p.21；经过些许改动的版本另収在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中，此书由 David Barnouw and Genrold Van Der Stroom 编辑（New York: Doubleday, 1989），第 67-68 页；这儿引用的是前一本书中的版本。

[2] *Newsweek*, June 16, 1952.

[3] *Saturday Review*, July 19, 1952.

[4] “Introduction,” *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53). p. ix.

[5]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October 23, 1955.

[6] *The New York Post*, October 8, 1955.

版中的安妮——是为了引起一些最寻常的反应，比如“人残忍地对待人”、“善战胜了恶”、“人类精神”的永恒真理等诸如此类的陈词滥调。这个剧本和这部电影运用舞台情节剧的传统手法将观众与战争岁月联系起来，但没有采用过于令人不安的方式。严肃的历史和安妮的许多犹太特征被弃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更温和、更普世、更易让人接受的快乐小女孩的形象，此外，道德勇气也走向了前台。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形象与奥托•弗兰克自己对其女儿日记的理解是一致的，他没将它看成是一本特别“犹太”的书，也不想看到它被编成一部“犹太”剧[7]。父亲所理解和想要展现的安妮是普世的，并不特别与其犹太根源相联系——这也是古德里奇和哈克特欣赏、并在剧本中塑造的形象。

简言之，我们这儿所拥有的是百老汇和好莱坞重新包装后的欧洲历史片段，作为反战和反一般性歧视的题材而出现。这里制造出来的安妮•弗兰克的形象更适合 50 年代人的口味，并不是夭折在纳粹手里的犹太少年的形象。舞台上由苏珊•斯特雷斯伯格扮演的和银幕上由蜜丽•彭美拉扮演的安妮是一位活泼可爱的邻家女孩——这个形象适应战后繁荣的时代精神，与普遍“感觉良好”的、保守的政治心态吻合一致。

后来对安妮．弗兰克的理解

在这种意义上思考安妮•弗兰克时，我们得意识到，今天我们所知道的纳粹屠犹在当时尚未开始深入公众意识。只是到了 60 年代初，随着埃利 • 威塞尔《夜》和汉娜 • 阿伦特关于阿道夫 •艾希曼的著述的出版，对纳粹时期犹太人命运的理解才变得丰满得多、严肃得多。这些书以及随后的书籍和电影的出现，纳粹种族灭绝才以比十年前更鲜明的面貌透露给大众。[8] 50 年代，安妮•弗兰克是最流行的战争岁月主角。然而是以非常特别的安妮•弗兰克的形象展现出来的——即便受到战争阴影的深深笼罩，她也是容光焕发、爱开玩笑和永远乐观的。主要是受古德里奇和哈克特的舞台剧以及史蒂芬斯的获奖电影的影响，这种对安妮•弗兰克的积极感受典型地体现在这种使她闻名遐迩的形象中：“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仍然相信人们心里实际上还是善良的”。这种振奋人心的形象直到今天还在全世界得到共鸣，仍然主导着人们对“谁是安妮•弗兰克”以及“她象征什么”的理解。

但主导并不意味着惟一，近年来其它表现方法大量涌现。其中一些挑战了这种去历史化、“去犹太化”的方法，后者使安妮•弗兰克的形象主要是伤感的、使她成了最后会藐视其迫害者并摆脱了侮辱和惨死结局的圣徒。这样的再创作已出现很多并仍在涌现，包括新电影和新电视版本的安妮的故事；包括大量儿童读物、录像带、影碟、学校课程，所有的这些都以日记里的女英雄为主角；也包括梅普 • 吉斯的回忆录和其他认识弗兰克一家的人的回忆录；更包括音乐会和音乐剧、以及广受欢迎的“安妮的世界”巡回展览等等。 弗兰克一家在阿姆斯特丹王子运河畔的住宅很有名，是欧洲观光客最多的纪念地之一，当然也是对数百万人如何看待安妮•弗兰克产生重要影响的地点。

在打造和重塑安妮•弗兰克形象的许多资料中，有三、四种特别突出。每一种都是对那种感伤化趋势的背离，正是这种感伤化的趋势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使安妮•弗兰克的日记吸引了如此多的注意力。但他们呈现给我们的安妮•弗兰克是否是大众准备接受的安妮•弗兰克则

---

[7] 若要了解安妮•弗兰克的父亲以及他在塑造其女儿形象上的作用，参见 Carol Ann Lee , *The Hidden Life of Otto Frank*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2003). 奥托 • 弗兰克对其女儿日记的戏剧版本的影响，有两个内容详实但完全不同的阐述，可参见 Ralph Melnick, *The Stolen Legacy of Anne Frank: Meyer Levin, Lillian Hellman, and the Staging of the Diar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和 Lawrence Graver, *An Obsession with Anne Frank: Meyer Levin and the Dia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8] 参见 Alan Mintz,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Shaping of Holocaust Memory in America*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eter Novick, *The Holocaust in American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99); Jeffrey Shandler, *While America Watches: Televis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lvin H. Rosenfeld, “The Americanization of the Holocaust” (David W. Belin Lecture in American Jewish Affair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95).

是另一回事。

1984 年，荷兰国家战争文件研究所的一队学者搜集了大量资料，编纂出安妮日记的评注本 (美国版于 1989 年面世)[9]。从学术角度说，此书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它将安妮•弗兰克当作作家关注，这不同于以前或以后的任何出版物。人们意识到这本著名日记的年轻作者有早熟的天分已经很久了，但只有通过这部评注本，人们才能看见其文学造诣的全景，才能理解其著作的复杂的形成史。

其中的故事很有趣，但仍不广为人知。简单讲，安妮不仅写了而且重写了日记中的许多篇目。她意识到了自己生活经历的特殊性质，认识到加工良好的叙述会有历史价值。因此，即便她每天都写出新的句子，她也要重温早期记录，开始将之打造成可在战后出版的手稿（可能当作一部小说出版）。可惜，她没有活着看到计划实现。可以肯定，有一部传诵很广的叫《安妮日记》的书存在，而且几十年来已经成了 20 世纪的文学经典。其最近一个版本甚至被叫做“定本”，但实际上是由安妮最新的译者米尔雅•培斯乐（Mirjam Pressler）准备的版本，该译者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奥托•弗兰克对其女儿著作的早期编辑和评注本中的一些素材编订了这个版本。真相是，我们永远找不到这部日记的什么定本，原因很简单，因为安妮•弗兰克在完成这部书之前就死了，她也没有授权他人以她的名义完稿。

然而，通过考察评注本中收集的文本改动，读者可以研究她做的无数编辑改动，真正体会到安妮•弗兰克是一位多么认真和熟练的作家。评注本读来吃力，不适合每个人，但鉴于它将我们带到象征的背后，让我们发现了安妮•弗兰克的作家身份，因此做了独一无二的、有价值的贡献。

当然，如果不仔细看她写的文字，人们不会将安妮•弗兰克当成作家。而看得越仔细，就越会看出这位小女孩是多么聪明甚至是多么复杂的一位作者。这儿有她 1944 年 4 月 11 日的几句话作为例证。

> 我们被着重提醒：我们正在藏匿，我们是上了锁链、被绑在一处的犹太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成千的义务……
>
> 谁让我们受了这种罪？谁让我们犹太人与所有其他人不同？谁听任我们饱受可怕的痛苦直到如今？是上帝，正是上帝使我们有如今的遭遇，但也将会是上帝再一次使我们兴起。若我们忍受所有这些痛苦，若还有犹太人存留，当这一切结束时，犹太人不是被毁灭而是作为榜样树立起来。甚至有可能全世界及所有民族都会从我们的宗教中学习善，为那个原因，也只是为那个原因，我们现在饱受苦难，谁知道呢。我们永远不会变成完全的荷兰人，或完全的英国人，也不会因此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代表，我们将始终是犹太人，但我们也想……
>
> 上帝从不离弃我们的民族。任何时代都有犹太人，他们在所有时代都不得不受苦，但这也使他们变得强壮；弱者倒下了，但强者将留存下来，永不倒下。[10]

这段话值得留意，因为它表明安妮•弗兰克明白自己身处犹太历史的洪流之中。只要不过分到宣称她还是犹太宗教思想家——毕竟她只有十五岁——人们就可以体会到她严肃地反思上帝的深思熟虑，然而这段话在古德里奇和哈克特的舞台剧中被完全删去了，取而代之的是这句软弱的话：“我们并不是惟一一个不得不受苦的民族，总有民族要受苦……有时这个民族……有时那个民族。”这几行文字不见于日记，日记上也找不到类似的话，它们把安妮•弗兰克的形象塑造得与原来的形象截然不同了。然而这正是剧本典型的主导动机，它呈现给世界的安妮•弗兰克比日记中的安妮情感单薄得多、不够深思熟虑、且无论精神上还是

---

[9] *The Diary of Anne Frank: The Critical Edition*, eds. Barnouw and van der Stroom.

[10] *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 (New York: Pocket Books, 1972), pp.186-87.

心理上也远远没那么严肃认真。

因此，为得到最真实的安妮•弗兰克，人们得读她本人的文字，而越过古德里奇和哈克特对她的呆板而平庸的重构。与我们拥有的其它资料不同，评注本可以使我们做到这点。[11]

近来对安妮. 弗兰克的理解

当然，日记的任何一个版本都无法做到的是：完成安妮•弗兰克的故事。因为她的故事没有结束，而是突然中断了。根据 1944 年 8 月 1 日的最后记载，安妮与其他七名藏身密室者被捕了；起先送入阿姆斯特丹一座监狱，后又送到韦斯特博克，这是一座位于荷兰北部的中转营，最后是离开韦斯特博克（1944 年 9 月 3 日）前往奥斯威辛。这些事实以及安妮死在贝尔根－贝尔森（大概在 1945 年 3 月初），早已弄清楚了。1958 年，德国作家恩斯特•施纳贝尔出版了一本书[12]，回溯这段历史，但有意思的是，施纳贝尔的叙述无档案根据，因此很难证实作者对安妮离开密室后的生活的报告。此书也将安妮•弗兰克理想化了，增加了快速笼罩她的神秘感，并圣化了她作为殉道者的形象。

幸好施纳贝尔书中所缺的已经由荷兰作家兼制片商威利•林德威（Willy Lindwer）提供出来，他拍了一部有价值的电影，并写了一本书讲述安妮•弗兰克在被捕之后几个月里的命运及她在纳粹集中营中的监禁生活。林德威的《安妮•弗兰克的最后七个月》让人不忍翻看，但对于想了解最后结局、想了解安妮•弗兰克全部生活真相的人而言，又是必须的。基于六位幸存犹太妇女的证词，林德威的书为安妮在韦斯特博克、奥斯威辛和贝尔根—贝尔森的时光以及安妮直到生命最后所遭受的迫害与折磨，提供了有档案根据的目击者的叙述。下面是安妮在贝尔根—贝尔森的狱友雷切尔（Rachel van Amerongen-Frankfoorder）的话，描述了安妮的临终时刻。

> 我又在营房里看见安妮和她妹妹玛歌……弗兰克姐妹自从头发被剃掉后，几乎认不出来了。她们比我们穿得要少得多……她们和我们一样寒冷。
>
> 当时是冬天，又没有衣服，因此所有产生疾病的条件都齐了。她们身形可怕。一天天虚弱下去……看得出来，她们病重了。弗兰克姐妹十分瘦弱，看起来很恐怖。她们因病而有些躁动，很明显，她们得了斑疹伤寒……她们皮包骨头，脸瘪下去了。她们冷得要命。她们住在营房最差的地方，靠着频繁开合的门。你常听到她们叫："关门呀，关门呀"，声音一天天衰弱下去。
>
> 你真可以看到她俩日渐死去……
>
> 她们的斑疹伤寒症状很明显……逐渐消瘦，有点无动于衷，偶尔有所好转，一直病到没有任何希望。她们的末日到了。我不晓得安妮和玛歌哪个先被抬走。突然我再也看不到她们了，因此我只得假定她们死了。看，我没有特别注意她们，因为同样死去的人太多了……
>
> 死尸总要抬出去，放在营房前面，早晨被许可上厕所时，你不得不路过它们。这就像上厕所本身也可怕，因为渐渐地，人人都染上了斑疹伤寒。营房前面有一种手推车，可以用来放置自己的日用品，有时不得不推着这种车上厕所。可能就在一次上厕所的途中，我经过弗兰克姐妹的尸体……[她们]已经被放倒在营房前面。然后死尸堆要被清理

[11] 2003 年 6 月至 12 月间，大批人来到美国纳粹屠犹纪念博物馆（USHMM）参观"作家安妮・弗兰克"展览，亲自见证安妮・弗兰克是怎样一位有思想、有天赋、有同情心的作家。无论他们带回家的这名少女的形象还有什么其它形象，可以肯定他们已经看到她以深刻、准确的方式记录和反映自己经历的敬业精神，也可以肯定他们已为之感动。

[12] Ernst Schnabel, *Anne Frank: A Portrait in Courage*, trans. Richard Winston and Clara Winston (New York: Harbrace Paperback Library, 1958).

走。会挖一个大洞，她们就被扔进去了。这点我肯定。这肯定是她们的命运，因为其他人也是这样。没有理由假定她们会与其他我们身边同时死去的女人有什么不同。[13]

这段对安妮•弗兰克临终日子的描述，被林德威书中引用的的其他妇女的证词所肯定，有理由相信它的真实性。安妮监禁的那段时间，斑疹伤寒症在贝尔根—贝尔森是失控的，而且当时正值冬天，食物少，许多人没有合适的栖身之所。疾病和迫害的结果是，成千上万人死于这座集中营。人们的遗体堆成一座座巨大的尸山，由"这儿躺了 3000 人"、"这儿躺了 5000 人"这样的标志标记。安妮•弗兰克——不到十六岁，但营养不良、精疲力竭、疾病缠身——就躺在贝尔根—贝尔森无名的死尸堆中。

读到如此残酷的信息，林德威的读者大概不会支持安妮•弗兰克在希特勒的集中营里"快乐"的观点，大概也无法想象她仍然会认为："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人们心里实际上还是善良的。"真是难以想象，但她最后的时光肯定经历了超乎寻常的痛苦。林德威对安妮•弗兰克生命最后几个月的描写令人沮丧，但如果人们想超越这位女孩勇敢、宽容和乐观的公众形象，而认识到她如同一百多万犹太儿童一样，也遭受了折磨和过早的死亡，这就是必要的了。

走向这种结局的历史在穆勒（Melissa Mueller）《安妮•弗兰克传》[14]一书中得到精彩叙述，此书后来成了美国广播公司（ABC）2001 年制作的四小时的电视系列片的蓝本。此书对于安妮•弗兰克的历史和家庭背景多有揭示，因此有助于澄清安妮的本来面目。

约翰•布莱尔（John Blair）受欢迎的 1998 年电影《怀恋安妮•弗兰克》（*Anne Frank Remembered*）同样如此，且取得的效果良好。然而，布莱尔长达两个小时的电影，其开头和结尾却故意用肯定普世化倾向的方式展现了安妮的故事。这种方式是奥托•弗兰克喜欢的，他刻意把女儿的形象塑造成这样，后来古德里奇和哈克特在对日记的舞台剧改编中又进一步升华了这一形象。然而，布莱尔的电影也是有价值的编年史，记述了安妮•弗兰克的德国犹太人血统、希特勒针对犹太人的屠戮以及部分荷兰人与纳粹合作的角色。

但在布莱尔看来，安妮的故事不"仅仅"是一则纳粹屠犹故事，也是一则有关普遍歧视的故事。为支持这个观点，影片以纳尔逊•曼德拉的简短访谈结尾。奥托•弗兰克也被引用，以支持这种观点：他女儿的日记与其说表现了犹太人在纳粹屠犹期间的经历，不如说传达了个体的勇气和希望在面对压迫时具有普遍的启示。为突出这个观点，人们可以在影片末尾听到安妮著名的章节（"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我仍然相信人们心里实际上还是善良的"）。这些并没有错，但任何艺术作品如果把纳粹屠犹视为不宽容或普遍歧视之恶的隐喻，就会铤而走险，不将它放在其特有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清晰地审视。因此布莱尔的《怀恋安妮•弗兰克》虽然在重要的方面修正了古德里奇和哈克特的舞台剧，但也与后者分享了同一种思想。

温蒂•凯瑟曼（Wendy Kesselman）对古德里奇和哈克特舞台剧的改编本于 1997 年 12 月 4 日[15]在纽约的音乐盒子（Musical Box）剧场上演。它以大胆的方式开始松解普世化倾向。虽说只取得部分成功，但作者的努力值得称赞。由于合同上要求她保留古德里奇和哈克特版本的主线，凯瑟曼无法随心所欲地改动舞台剧的早期版本。然而她在几个重要方面成功抵消了 1955 年舞台剧传达给人的"良好感觉"。

该剧的对话明显提到了犹太教、犹太人的苦难以及对犹太民族遗产的感情。通过加进希伯来文祷告，凯瑟曼重塑了古德里奇和哈克特的版本，强调了安妮及其他躲藏者的犹太身份。第一幕一开始就展现了犹太人被迫带上的黄星，第二幕末尾纳粹登上舞台，她将纳粹屠犹的恐怖表现得更为形象化了，这在早期版本中是没有的。在戏剧尾声处又出现了台词"尽管发

---

[13] 引用自 Willy Lindwer, *The Last Seven Months of Anne Frank* (New York: Pantheon, 1991), pp. 103-105.

[14] Melissa Mueller, *Anne Frank: The Biography*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1998).

[15] 这部戏的底本目前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The Diary of Anne Frank by Frances Goodrich and Albert Hackett*, newly adapted by Wendy Kesselman (New York: Dramatists Play Service, 2000).

生了这一切，我仍然相信人们心里实际上还是善良的”，但剧终前的这句话话音未落，一名纳粹军官就大叫：“出去！”这一严厉的命令以尖叫的形式发出，不仅淹没了安妮•弗兰克乐观的言语，同时也表明在纳粹恐怖面前，这句话无法让人产生共鸣。该剧最后的台词由奥托•弗兰克说出，但这次没有说安妮在集中营中的快乐。相反，台词展现了极度震撼人心的悲惨事实：密室中原来那八个藏匿者，除了他，都在纳粹集中营中丧命。

总之，凯瑟曼对古德里奇和哈克特的重构是很明显的，使得我们不必永远固执于 50 年代的公众对安妮•弗兰克的理解上。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人仍喜欢用那种方式来表现自己版本的安妮•弗兰克，在他们那里，一切都是老样子。

例如伊妮德•福特曼（Enid Futterman），她为音乐剧《我是安妮•弗兰克》写过歌词，此剧于 1996 年在纽约上演。福特曼说过这样的话：“她知晓恶，但也知晓性本善……恶在贝尔根—贝尔森胜利了，但精神之战赢了，安妮逝去了，但她赢了……[她]超越了自身的痛苦，超越了自身的死亡。”[16] 福特曼是在 2000 年 2 月 3 日的采访中说这番话的，正好在林德威的书、穆勒的传记、布莱尔的电影以及凯瑟曼的戏剧问世之后。但这番话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作者知道当时已经出现了对安妮•弗兰克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与安妮成功超越了死亡的愉快感情针锋相对。

这个论断对接下来取自 1998 年音乐剧《你的安妮》（*Yours, Anne*）的评论也同样适用。“就算不知道安妮及其家人被发现了、并在纳粹死亡营中遇害，在观看《你的安妮》时，你仍会不由自主地怀有那种莫名的、不可能的希望，以为她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很难想象这个小女孩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之光会被带走。”作者在评论结尾不带任何讽刺地引用了那句名言（“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以此总结安妮•弗兰克故事的意义。[17]

安妮．弗兰克的意义

现在，读者们对这句话耳熟能详，都能背出来。对安妮•弗兰克积极的那面——如欢快、乐观的一面而言，这句话没有错，但它难以涵盖她生死的全部意义。许多人不愿面对安妮•弗兰克故事中更阴暗的方面，正如他们不愿承认希特勒统治期间犹太灾难的特性和规模一样。尽管这不容易理解，但数百万无辜的犹太人在纳粹大屠杀中遇害主要不是普通种族主义或普通歧视（尽管同样可恶）造成的，甚至也不是战争造成的，而是由于其它因素——这正是我们还在努力理解和正确命名的。我们称之为“纳粹屠犹（Holocaust）”或“浩劫（Shoah）”或“毁灭（Khurbn）”， 但这些术语迄今为止只能让我们澄清，什么使得像德国这样先进的民族会集中一个现代国家的全部力量去鉴别、审判、追捕并最终杀死像安妮•弗兰克这种无辜又无害的少年。她究竟向德国人展现了何种危险，使得如此多的德国人及其盟友对她及对整块大陆上像她一样的人发动并执行一场种族灭绝战役呢？

直到今日，我们还没有完全令人满意的答案。我们知道的只是安妮•弗兰克身为犹太人的事实宣判了她的死刑，这判决无情地向她和至少一百万犹太儿童执行了。在纳粹占领的欧洲，身为犹太人就意味着成为一名身不由己的候选人，将受到有组织的迫害、摧残、恐吓，而最终难免一死。从她可怕的结局中得出的意义再也没有比这更明显的了。从这残酷的事实中找不到任何安慰和积极的教训，这里肯定没有生命美好的证据。

然而，像她自己的父亲及其他无数人乐于看到的那样，安妮给世界的启示被当作一个希望、信心、宽容和理解的启示而被记住。这些理想值得赞美，也确实出现在安妮•弗兰克的著作中，但除非将安妮在阿姆斯特丹的故事与她在奥斯威辛和贝尔根—贝尔森的故事分开，即将她作为纳粹主义的犹太遇害者的故事与数百万与她有同样命运的犹太人的故事分开，才

---

[16] 参见 “The Artist, Enid Futterman: My Journey with Anne Frank,” www.musicalheaven.com/i/i_am_anne_frank.html.

[17] Barbara North, “Anne Musical Moves,” *See Magazine* 257 (October 29, 1998).

能将这些理想抬得高于她这本名著中的其它内容，才能判定它们与超越性价值相似。然而，奥托•弗兰克自觉地将其战后生涯投入到将其女儿的形象塑造成闪光的形象，树立成活泼乐观、对人类永远有希望的象征这样的活动中去了。他向公众传播他所谓的安妮的“思想和理想”，视此为自己的责任，若这个任务需要将他女儿故事的犹太成分置于他所发掘的世界意义之下，他也会这样做。

其他人巴不得跟着他走。古德里奇和哈克特舞台剧的最初制作人布卢姆加登（Kermit Bloomgarden）和最初导演卡宁 (Garson Kanin)，为了呈现他们所认定的主旋律——即普遍的痛苦以及用永恒的善与希望来超越这种痛苦，而将安妮日记中几乎所有的犹太特征都过滤掉了。最近布莱尔谈论其奥斯卡获奖电影《怀恋安妮•弗兰克》时，宣称他也从奥托•弗兰克那里受到启发。

> 在我看来，这部电影传达的启示与奥托•弗兰克要传达的一样……他觉得不应只局限于犹太大屠杀经历。许多人觉得纳粹屠犹只是犹太人的遭遇，因此安妮的故事应当特别关注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我不同意这点……我坚定地将我的旗帜与奥托的普世主义启示连在一起。[18]

像所有重要文学作品一样，安妮•弗兰克的故事可以产生许多启示，但发现这些启示的惟一途径是：查看展现其故事的特定语境。安妮的经历离开了犹太人对纳粹屠犹的经历根本就无法解释，超越或冲淡这点将不可避免地歪曲和窜改她的经历。此类窜改（无论有意无意）几乎从这本日记问世起就开始伴随它了，并因为那种想要感伤化和理想化其故事的顽固倾向而一直延续至今。这样一来，安妮•弗兰克的形象更接近基督教传统，基督教传统赞美那些以圣洁的天性超越人类苦难之蹂躏的人；而不是接近犹太教传统，犹太教传统哀悼不义和不可赎之苦的牺牲品——这恰恰是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犹太人的经历。

操纵安妮．弗兰克的形象

在安妮•弗兰克的例子中，通过对其形象的政治利用，历史也被绕过和颠覆了。任何人只要注意到世界各地今天如何引用这本日记就能看清这点。例如，2004 年 3 月，采访北朝鲜的荷兰电视工作者报道，安妮•弗兰克的书已被采纳为全国中学生的必读课本——乍看起来，这真是令人吃惊和鼓舞人心的进展。但采访人员接着就发现，在这个斯大林主义色彩浓郁的国家，老师用这本日记使学生相信，自己国家的遭遇与躲避灾难的弗兰克一家无异；使学生相信，当代美国人就是希特勒时代的纳粹，而美国总统与希特勒一样邪恶。在平壤的采访表明，安妮•弗兰克的所谓“遗产”是含糊不清的。一位北朝鲜少年说：“要想获得世界和平，就得消灭美国人。只有到那时，安妮的和平之梦才会实现。”[19]

阿拉伯世界也常出现对这本日记堂而皇之的滥用。在目前称为“巴勒斯坦大屠杀”的事件中，安妮•弗兰克成了无所不在的参照，毫不奇怪，蓄意寻找“巴勒斯坦的安妮•弗兰克”也大有人在。半岛电视台近期的一则故事展现了如下计划。

> 想想吧。为博取对犹太人的同情，人们设计了一本宣传书籍[指安妮•弗兰克的日记]。一名少女躲避坏人的故事在美国的许多学校是必读的。成长中的少年不理解宣传和炒作的太多了，他们读过这个少女躲避危险的故事，并信以为真。他们意识不到，他们潜意识里同情的不是任何女孩，而是一名犹太女孩……
>
> 这使得我思索。若它能为犹太人服务，为何不能为别人服务呢？一名巴勒斯坦作家

[18] 参见 “An Interview with Jon Blair,” www.sonypictures.com/classics.annefrank/misc/interview.html(accessed 7/21/2004)

[19] 引自 Damien McElroy, “Anne Frank Diary Used to Portray Bush as Nazi,” *Telegraph* (London), March 8, 2004.

要是能发现一名有麻烦的巴勒斯坦少女会怎样呢。她的兄弟可能被狙击手打死了，她父母可能被压路机碾死了。或者她的家被以色列炸药摧毁了。如果一名巴勒斯坦作家能写出这个故事，用《安妮•弗兰克日记》那样的手法和风格来处理，也许本书就能像《安妮•弗兰克日记》一样受欢迎。它可能会使老百姓清楚这名巴勒斯坦少女是如何生活的。正如《安妮•弗兰克日记》让大家知道了犹太少女安妮•弗兰克是如何生活的……

肯定有数千……巴勒斯坦少女有这样恐怖的故事，足以让整个世界为之揪心。

这样试试没什么坏处[20]。

实际上，阿拉伯作家一直在尝试。穆娜•哈姆泽赫（Muna Hamzeh）在其记叙巴勒斯坦难民营生活的日记中哀告："安妮•弗兰克，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就是你死去的因由吗？因此你的民族就可转过身来对其它民族进行集体迫害吗？你很年轻，死得不值，而你死去仅因为你的身份。现在他们以同样的因由来杀害我们。"[21]任何熟悉当前阿以战争的人都知道，巴勒斯坦人正在被杀害，以色列人也同样在被杀害，但并非因为他们的"身份"或其他什么类似于杀害安妮•弗兰克的动机。然而，她使用了"集体迫害"（pogrom）一词，穆娜•哈姆泽赫运用了表示犹太苦难的词，使得巴勒斯坦人的遭遇与犹太人的遭遇很难区别开来。

其他人也作了同样努力。在评论格哈达•凯米(Ghada Karmi)的回忆录《寻找法蒂玛：一则巴勒斯坦故事》[22]时，默罕默德•可汗评论道："凯米的故事是一则巴勒斯坦女孩及其一家被赶出家园的故事……立刻使我想起了安妮•弗兰克及其一家在纳粹德国的困境。"他继续指出："少年凯米在书的封面上的照片与安妮•弗兰克在其日记封面上的照片惊人相似。""一名大意的读者会认为她们实际上是姐妹。"评论者继续道：

二战结束后不久，……作为欧洲反犹主义和纳粹迫害的遇害者，欧洲犹太人……迁到了中东的心脏地带，迅速殖民了无防人之心的巴勒斯坦人的国度。这样，一度在欧洲受到大规模迫害的遇害者，一夜之间在巴勒斯坦这块历史重地上成了另一个完全无辜的民族的压迫者。就在安妮•弗兰克这个美丽的德国犹太女孩的故事终结时, 另一则故事, 有着无法言说的恐怖的故事, 实在是现代史上最大罪孽的故事，则被一名巴勒斯坦人记载和告知了我们，这人做姑娘时也被迫离开家园。这就是格哈达 •凯米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故事。[23]

许多年来，将犹太人描写成纳粹、将巴勒斯坦人描写成犹太人的修辞已成为阿拉伯宣传中东冲突的一个部分。尽管历史事件鲜有类似者，但把以色列犹太人给巴勒斯坦人造成的苦难等同于希特勒给犹太人造成的苦难现在已被广泛接受——不仅仅为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接受，也为相当数量的欧洲人和其它地区的人接受。"巴勒斯坦的安妮•弗兰克"这种概念也被附会在这种语境中，但是细看的话，就会发现这种附会纯属子虚乌有。例如，从 1949 年起，格哈达•凯米就一直生活在伦敦，她几十年前就接受了英国文化，并为英国社会所同化。与之对照，安妮•弗兰克从未经历过十六岁生日，就躺在贝尔根—贝尔森无名的尸山中。无论在这个例子还是无数其它例子里，尽管她们的故事明显不同，但安妮•弗兰克的经历都被蓄意融入其他少女经受的各式困苦的经历中。[24]

---

[20] David Little, "Could a Little Girl Be the Key to Stopping the Violence in Iraq and Palestine?" *Al-Jazeerah*, June 13, 2004.

[21] 引自 Rodney Carmichael, "Jewish Studies Class Draws Fire from Some Local Jews," *WACO Tribune-Herald*, April 28, 2001.

[22] Ghada Karmi, *In Search of Fatima: A Palestinian Story* (London: Verso, 2004).

[23] Muhammad Khan, "Voices of a People Living in Exile," www.musilimnews.co.uk/paper/index.php?article'1582 (accessed 7/20/2004).

[24] 例如，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Zlata Filipovi 作为《Zlata 日记》的年轻作者，被欢呼为"萨拉热窝的安妮 •弗兰克"。在对这名"无辜而聪明的孩子"的困境进行一段时期的密集宣传之后——其叙述直接套用阿姆斯特

这种努力是一种公然霸占的形式，也是阿拉伯传媒的一般特征。“见见今天的安妮•弗兰克吧”，优素福（Yusuf Agha）在一篇题为《巴勒斯坦的安妮•弗兰克》的文章中提议。作者接下来展现了几位安妮•弗兰克在巴勒斯坦的替身，描写了其中的苏阿达•卡扎尔（Suad Ghazal），一名十七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在以色列一个监狱（Ramle）服刑时，用了下面的话：

> 一旦孤身一人，我知道我快要把眼睛哭出来了。我和衣滑倒在地，开始热烈祷告，然后我把膝收到胸前，头埋在臂弯里，哭泣，在光秃秃的地面上蜷缩成一团。大声的抽泣又使我躺倒在地上……
>
> 我进入了不介意生死的境界，世界没有我还照样运转，我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任何事件。[25]

但这并不是苏阿达•卡扎尔在囚室中的言语，而是安妮•弗兰克为数不多的放弃希望时刻的言语。尽管此处展现的两个女孩的经历十分相象，但实际上不具有可比性。苏阿达•卡扎尔最后被关入以色列监狱，并非因为她是巴勒斯坦人，而是因为她试图刺杀住在西岸的一名以色列人；相反，躲在阿姆斯特丹家中阁楼上的安妮•弗兰克是一名犹太人，正在躲避纳粹追杀者。这名巴勒斯坦少年因企图谋杀而遭监禁但最终会被释放。而这名犹太女孩因为是犹太人，而没有机会被判缓刑——在当时的欧洲，身为犹太人就意味着死刑——并且被杀害了。尽管有许多不同，苏阿达被蓄意塑造得与安妮•弗兰克相像。“我是巴勒斯坦的安妮•弗兰克”，她自豪地宣布：“以色列的希特勒在我周围以折磨我为乐……尽管我本人没有犯任何罪，但是世界上的罪都对我犯了”。[26]

很难知道苏阿达•卡扎尔是否真的相信自己所说的，但很容易陷进这种夸张的修辞中，而由衷地将自己想象成与真正的希特勒造成的犹太遇害者相同的遇害者。这让我立即想到威尔科米尔斯基（Binjamin Wilkomirski）的令人警醒的案件，此人是臭名昭著的假纳粹屠犹“回忆录”《碎片》（*Fragments*）的作者。在遇害者被英勇化的时代，将自己打造成极权和非正义的遇害者，既诱人又有利可图。既可以博取世界的怜悯，又能够抵消任何对自己境况负责的个人责任感。

当然，这样的政治计谋一点也不晦暗和微妙，它们取决于各人的政治倾向，人们对此既可同意又可否定。然而，人们应当充分意识到，这种修辞行为就其本质而言是操纵性的，违背了历史记忆和对真理本身的诚实。将别人的历史——这里是将安妮•弗兰克的历史——据为己有，乃属于不可避免的滥用，也就是说，为了宣传而利用一个人的悲惨经历去扩大和抬升另一个人的悲惨经历。毫无疑问，穆娜•哈姆泽赫、格哈达•凯米、苏阿达•卡扎尔以及其他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曾过着艰难、令人同情的生活，但是将她们的故事与安妮•弗兰克的故事联系起来则带有欺骗性——这就好像把安妮•弗兰克的故事理想化或感伤化、使之成为暴虐世界受压迫的一种普世象征也是一种扭曲。

如果这些倾向还得不到阻止，纳粹屠犹最有名的遇害者安妮・弗兰克虽说仍将被记住，但记住她的方式却会有损于记忆纳粹屠犹本身的历史准确性和道德责任感。

丹那位写日记的著名犹太少女——Zlata 迁居巴黎，一直生活至今。

[25] 引自 Yusuf Agha, “The Anne Franks of Palestine, ” YellowTimes.org (June 20, 2000), www.yellowtimes.org/article.php?sid’410 (accessed 7/20/2004)

[26] 引用自 Edna Yaghi, “My Humanity on Hold, ” www.hejleh.com/edna_yaghi/suad.html (accessed 7/20/2004).